



□梁鸿

我突然意识到,我无法回应和碰触我孩子的痛苦,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,而是因为,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。在以爱为名的种种行为和话语中,我,我们这些自诩为爱孩子的人,逐渐走向了爱的反面。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爱,不知道怎么理解生命的本质意义,不知道怎么连接孩子,更不知道我们应当怎么穷其一生去应对我们生命内部的“恶”——由无知、懦弱和盲从化合而成的对孩子的压抑。

快乐、幸福是如此遥远,以至于许多孩子被置于无限的灰暗之中,找不到出路。

我在哪里错过了你,我亲爱的孩子?那是2022年5月的一天。我意识到我精神痛苦的某一来源,并且努力去探寻它。

我惊讶地发现,有那么多孩子在遭受着心理创伤,并且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。“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,社会亟须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。”《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》给出的调查是如此令人惊心。而医院精神科逐年递增的未成年患者,心理咨询室越来越多的在校学生,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。

我在《要有光》中把我的写作对象集中在那些因为心理问题而失学、休学在家的孩子,以及在退学边缘挣扎的孩子,这些不被看见的孩子“被困”在家里,无法出门,无法走进学校。我想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,看他们如何思考自己,如何看待父母、学校、社会。由此,我进入一个个家庭内部,试图寻找孩子、父母之间的关系状态,他们组成了一个怎样的小世界,影响并塑造着孩子的情绪及认知;我进入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,那些失学的孩子集中在这里,了解他们如何被治疗,如何被救助,他们之间构成怎样的关系和氛围;我进入学校,去了解学校、老师和孩子之间构成怎样的网格;我还想了解精神氛围以及社会理念,它们作为无形的东西又和孩子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。

我想寻找到那些少年,去倾听他们的故事,去了解个体生命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剧烈冲突,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孩子的心灵,孩子如何失去成长的土壤,失去父母、学校和社会的系统支撑,被“悬置”起来。最终,我想寻找到:在我们的文化内部(传统的和当代的),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层,我们究竟是如何对待孩子,如何理解生命本身;在我们的日常行为和社会观念深层,到底隐藏了多少习焉不察的行为惯性,它们和我们对孩子的爱背道而驰并成为问题的源头。

我想走进家长的内心,去努力体会并辨析他们的情感状态、思维形态以及与社会的关联形

式,而这些又以怎样的方式去影响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。我想去努力寻找,我们到底在哪个地方错过了孩子,以至于我们的痛苦和他们的痛苦擦肩而过,彼此无法感知。

我想寻找到,在不断遭受创伤的过程中,孩子如何自救,家长如何自我反省,这中间的痛苦和彼此的不断接近最终形成了怎样的光亮,让生命的韧性充分展示出来。

最终,从更广泛意义上讲,我想追寻一个本质的问题:什么是爱?我们该如何去爱?为什么我们和我们最爱的人无法相处?

当我开始把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,超大城市、中等城市、县城、农村时,当我面对一个个家长、孩子,面对精神科医生、心理咨询师、学校校长、老师等等,去倾听他们的故事,和他们一起悲伤,一起感受希望和困惑时,我感受到了彼此呼唤以及相互回应的可能,这使我备受鼓舞。我充满了写作的热情,充满行动的勇气和探索的决心,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孩童时代,纯粹、天然、生机勃勃地打量这个世界,我好像又拥有了某种力量,去直面这个世界,直面每一个人、每一种人生。

我想和孩子们一起成长。我也希望大家跟随孩子们的故事,去倾听、感受、思辨,最终和他们一起成长。

正像《要有光》中的吴用所说:“妈妈,你得继续学习。”我想,这是孩子对所有人的呼唤。

希望我们能够听到彼此的呼唤。

(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作家)



梁鸿

□刘华杰

古人云:“物物而不物于物。”由于“现代性”,庄子的这句话很难落实,却可以不断提醒人们。现代社会并不缺少“物”,但许多场景下人们用物而不睬物。科技已经取代博物的地位,如今多数人不知何谓博物、博物学。

博物的概念,古今中外都有,而且很早就有。亚里士多德、老普林尼那里有博物、博物者;元人袁桷曾说:“自古乾坤合神化,空将简牍费冥搜。张华博物身终死,邹衍说天舌竟休。”考古学家专门提“博物智能”,似有蹭人工智能热度的嫌疑,其实并非如此。博物智能强调与“物质”“原子”的关联,而人工智能则强调与“信息”“比特”的关联。博物学或者博物智能重新被关注,与地球上这个物种的不恰当发展有关,与地质学概念“人类世”有关。在人类世,人应当重新思考:我是谁、来自哪儿、想干嘛、正在做啥?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人这个物种的可持续生存?

《奇兽之鉴:〈坤舆全图〉与大航海时代的海怪陆兽》这本书涉及东西方交流、全球化、西方科技兴起等大背景,并不专门讨论哲学、环境史学、教育学关注的玄虚问题。但是,关联是真实存在的,查尔斯·C·曼恩甚至认为,全球化根本上就是一种“生物现象”。全球化现象近半个世纪才引起广泛关注,其实其发生可以向前追溯很久,只是规模不同,也不冠以相关的名头。全球化包括思想和文化的交流,更包括人和物的往来。两方面有内在联系,理应得到同等对待。“见物不见人”与“见人不见物”都不合道理。

进入新世纪(也可以提前至20世纪80年代)后,环境史研究成为学术热点,特别是在博物学复兴的大潮下,学术界对人与物的关系、对“物”的交换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文化,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,多个学科不分彼此,交叉前行,令人耳目一新。表面上看,对具象化的、“层次较低”之“物”的倾心,是学术推进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现象,但离开了人与自然矛盾之激化、现代性人性之扭曲这般更大的背景,相关学术繁荣是不能得到解释的。地理学、环境史、生活史、地方性知识、博物学文化等都不约而同地重新发现“物”。看见“地方”,自然就包含着看见附着于地方之“物”与“物之网络”。而看见“地方”是有条件的,只凭明亮的眼睛是不够的,思想必须先行,有看的欲望,有看的心态,有看的能力。

人类是非常特别的物种,西方哲人称之为理性动物,进而突出人之主体性、个体之权利、“我思”的重要性。不过现在看来,“理性”没法儿纯粹,在操作中经常变成“非理性”,人类群体和个体在争取权利和自我解放时有做得不够的地方,有时也过了头。重启博物学,前提是人这个物种经常忘记自己的动物属性,不顾自己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分,现在需要往回拉一拉,紧贴大地,时时向其他物种学习,别那么嚣张,别那么一根筋地“暴走”。否则,人类的那点“理性”可能令人这个物种夭折,早早退出历史舞台。以理性名义加剧的各种折腾已经令人类自己身心疲惫,也令生态环境不堪重负。

博物学在中国的复兴首先是哲学界(而非科学界或者科普界)少数人推动的,不是凭空发动的,也不是独自在奋斗。这股学术潮流迅速与科技史、自然文学、环境史、艺术史、文化史、自然美学等融合而一道前行。想来有点奇怪,在一般人印象中,哲学通常只关注抽象概念和理论,而蔑视感性和具体经验。哲学抽象而博物具体,两者怎么混到了一起?学界也真实存在这样的偏见,以为仅仅盯着概念就能做出有特色的哲学。实际上不要忘记“两极相通”这一俗语。老子、庄子、王阳明的哲学,亚里士多德、培根、达尔文、海德格尔的哲学,都与经验世界、与“物”有密切关联,却常常被后来者忽略了。

即便不讨论哲学,就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某一件物品,包括文物和画作,进行解读,第一步便是上面展示了什么东西,这便与名物、博物有关,之后才谈得上境界、理念。表面上这第一步是一种颇低级的“前学术”预备工作,似乎比不上意义阐发来得高级,但是这是一种错觉。辨物知名,非常基本,却并不低级。在一定时期它确实被一些人忽视,但它考验的是基本功,与重建历史场景有关。作品创作之初,所描绘之物大多是其时代、其作者“生活世界”中的熟悉之物,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场景的转换,后来之人的“生活世界”发生了许多变化,即便加上学术专研和若干想象,也不容易熟识原来之物。再考虑到现代分科教育培养人才的模式,人文学者大多缺乏具体的动物、植物、菌物分类学训练,除非个人有特别爱好,见到历史作品所描绘之物经常感到棘手。时常见到学者分析某件作品的意境、学术价值、所属学派时口若悬河,而被问及作品上的动物、植物、器物究竟是啥东西时,调门突然就低了下来。

本书由人文学者而非动物学家来专门讨论《坤舆全图》中的海怪陆兽二十余种,本身就有重要意义,细致的分析更是引人入胜。程方毅和赖毓芝两位学者的研究十分重要,却不是孤立的。韦陀先生专门研究过《乾坤生意图》,并写成一本专著,只是其中的动植物都是中国“本土种”,不涉及跨海交流。“无穷小亮”(张辰亮)《海错图笔记》系列、王钊对《塞外花卉图卷》的研究、张国刚对《落花游鱼图》的研究,所涉及生物也是“本土种”。曼恩的《1493: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》、邹振环的《再见异兽: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》、陈水华的《形理两全:宋画中的鸟类》则涉及异域物种,与本书接近。所有这些新型研究,都给艺术史、文化史、科技史、图像史学等带来了新鲜气息,同时吸引了一批专业领域以外的读者。有人可能会讲,说到底,不就是若干名字吗?不就是一些东西的迁移吗?没错,但是它们是基础、是根本,离开它们做学问、讨论问题就可能不靠谱。在互联网和数据库越来越发达的今天,用恰当名字作为关键词、检索词的意义大家都是清楚的。更为重要的是,名字以及“名实对应”是重构“生活世界”的钥匙。

(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物学家)